

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选又重新启动了,它犹如一根引线,将我的思绪牵向 1991 年的首届评选。

那年 4 月中旬,在鲜花盛开的上海桂林宾馆,静悄悄地云集过一批名人,他们是首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审委员会的 21 位评委,张瑞芳、袁雪芬、孙道临、黄佐临、黄贻钧、丁善德、朱践耳、沈柔坚、蒋孔

阳、徐中玉等人都名列其中。他们个个成就斐然,闻名遐迩,是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骄傲。由这样一批大师级的专家学者承担起上海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奖的评审工作,足见上海对该奖项的重视程度。

两天半的评审有一半时间用于审查有关材料和作品。此前,各文学艺术类别的初审评委已对提交的参评人选和作品进行过严格的筛选。现在终审评委将从筛选后的名单中评选出首届杰出贡献奖和优秀成果奖的获奖人选和作品。当时,我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参与了评奖的整个过程,它使我有幸能够为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艺术家服务,并真切感受到他们的大家风范,实属难得。

午后的宾馆十分静谧,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我按房号顺序去各屋送材料。轻轻敲了敲蒋孔阳先生的房门,开门的是他夫人濮老师。她说,他的身体一直欠佳,但他执意前来,只得陪同照顾了。蒋先生已从教 40 年,著作等身,对我国当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刻,他正背对着我在伏案写东西,不时翻看一下旁边打开的评审材料。濮老师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他耳朵不好,这是他的工作状态,为了看这些评审材料,这几天他在家就没好好休息过。他看东西时总爱随时动笔批注些什么,这会儿他是目中无人的。我赶紧放下手中的增补材料,悄然退出,生怕打扰了他。

旁边是丁善德先生的房间,房门虚掩着。进到里面,发现朱践耳先生、胡蓉蓉老师也都在。他们仨围着张小茶几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什么,见到我,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说音乐舞蹈方面的人选和作品,他们都很熟悉,意见也一致。刚才大家在说的是参评的京剧《曹操与杨修》,可惜只看到剧本,谁都没有观看过舞台演出。丁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也是著名作曲家,他说,舞台剧是综合艺术,编、导、演、音乐、舞美等都要考虑,现在看来剧本基础很好,但评审嘛,就必须看看整体才能心中有数,说话有底气。我说,晚上已安排了放一些作品的录像,也有该剧在内。几位

听了一致称好,朱先生说,不知作曲是谁?戏曲的作曲唱腔十分重要,一定要去看的。

迈出这门,又去黄佐临先生的屋。他见是我,很高兴,说:“真想找你耍些朱卮瞻老先生百岁前后的画作看看呢!”我应承下来,准备给有关单位打电话问问是否能送过来。我与佐临先生很熟,他儒雅的气度随处

可见,进屋就客气地先让坐。他的写字台上堆满了翻开的评审材料,我就知道他也正在“用功”。“看得老眼昏花了,从家里看到这里,读到了不少东西,推荐的人选和作品,真有相当不错的!”这会儿他还沉浸在朱卮老的材料中,很感慨地对我说,高龄还能不断变法出新,百岁还能老枝抽芽办画展,古今中外也难得啊!说起她女儿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围城》也在候选作品名单中,他仅说了一句:“拍名家名著,首先要用心。”

张瑞芳老师的房间最靠里,到她屋里送材料时,已近黄昏,天边有了晚霞。瑞芳老师望着窗外对我说,你看夕阳多美!在材料文字堆里埋头了大半天,你来,正好让我的眼睛放松一下,语气中透着一份亲切。她收下我给她的补充材料,忽然问我,这次候选的杰出贡献奖人选为什么不见巴老等人?巴金可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巨人啊!我心有同感,却也有点不知所措,心想,也许是因为上海文学艺术奖是两年一届,在评审年度里申报者须有公开展出、展演、展映和出版的文艺作品之缘故?瑞芳老师沉思了一下说,章程是人制订的,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师,一定不能忘、不能遗漏。这时正好孙道临先生也进来了,他听后表示:“举双手赞成!”果然,这条珍贵的意见在以后的大会上得到了评委会全体人员的一致赞同,评奖章程也在以后几届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次日是大会评审,由刘振元副市长和徐俊西副部长轮流主持。会场气氛始终热烈,有附和,有争议,每人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那时没有电脑,我作评审记录,直记录到写字的右手要抽筋。傍晚时分,经过几轮投票,评选结果终于出来了。获得首届杰出贡献奖的是朱践耳、朱卮瞻、蒋孔阳,获得优秀成果奖的是京剧《曹操与杨修》、电视连续剧《围城》、中国画《母亲》等十部作品,可谓实至名归。

二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当年许多参与评审工作的老一辈大师大家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名字依然穿越时光留驻在那里,并彰显出高昂的精神力量,照耀着后人继续前行。

“六帆斋”是我书斋名,无甚深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挂历,我不选美女风景、生肖名画,而专挑寓意“一帆风顺”六张帆船图案的,故名。

现今,我的一天时光,基本上在书房度过。退休回家后,一大动作是把原先 1.6 米的大书桌和外面买的电脑桌请出送了人,定制了具有原有功能的两件家具。但那决非重复,而是增加了特定的书架部分。写字台宽小到 1.1 米,增加了一个 1 米宽、1.4 米高的书架。电脑桌除了脚可伸进之外,右侧和桌肚内侧都成了书架。书籍只有立起来,才方便查找。当年我制作四壁书橱,前后两层,后层各加了块 5 厘米高的搁板,就像拍集体照后排人站在凳子上,书脊上的书名便露脸了,一目了然。

我喜欢购书,工资大部分都交给书店。那时还有内部书供应,我中意《(郎吉回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和《摘译》等。中外文学名著是不可少,后来逐步将主题集中到文史方面,买的都是初版书。每本只有几角钱的《走向世界丛书》《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便宜得让人不可思议!一套《佩文韵府》或《辞源》,只有 40 多元,买得早啊!从旧书店淘来的几百册《丛书集成初

今年夏天,在上海文化广场讲演时,我开篇即说:“当我们面对孩子,觉得他们天真、坦诚、率性、可爱……这时,我们其实还应充满敬畏,因为他们太神秘,太神圣了,他们同时也是我们的祖先!”

全场愕然。但当我把“复演说”的原理简单解释一遍,将列维·比留尔的《原始思维》与我们从儿童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比照一番发现惊人相似的时候,听众大都露出会心的微笑。是的,儿童们身上处处显现了人类发展史的痕迹。我又说了从儿童研究出发,以“复演说”为工具,能够解开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之谜,也有助于解开人类史上语言、情感、理性思维孰前孰后以及此三者关系等诸多难题,全场活跃起来。这次讲演结束时,大家提问热烈,相互探讨的时间竟和整个讲演时间差不多。

上述内容,其实都取自我的新著:《美与幼童》(江苏少儿出版社)。在我的写作经历中,这本书稿的形成过程甚为奇特,前所未有——它几乎就是讲演的产物,是

1928 年 8 月,戴望舒的《雨巷》发表于上海《小说月报》,他由此获得“雨巷诗人”之誉。嗣后,这位海派诗歌代表人物的四本诗集均在沪问世。

1929 年 4 月,上海水

戴望舒与四本诗集

朱少伟

沫书店出版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他特意在扉页题辞给意中人。谁知,对方却保持沉默,戴望舒继续充满激情地给她写情书。有一天,戴望舒既给意中人写情书,又为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撰稿,匆忙中竟装错信封。结果,那位姑娘拆信一看,见是戴望舒的文章,感到莫名其妙;而《现代》杂志编辑看了戴望舒的情书,觉得真挚动人,不加修改便刊出。此事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以致双方都有点难为情。由于戴望舒执著追

美与幼童

刘绪源

在不断的讲演中激发灵感,促进思考,逐渐增补完善的。

在两年间三十余场讲演中,我每次都抱着一点进取之心,事前的准备总是紧张而艰难,生怕临场乱套,生怕考虑不成熟。可以说,有关这一题目的讲座,每次都有新的观点和内容,没有一次是轻车熟路,完全重复的。所以,同一话题我曾在好几个单位,面对同一群人

讲过两次以上(中间相隔半年多),而听者并不觉得雷同,这令我颇觉欣慰。而讲演之后的交流,也非常重要,不仅提出的质疑可使我深思慎思以致开拓新的思路,还常有大量生动新鲜的材料迅速堆积在我面前,令我目不暇接,兴奋不已。虽然想对儿童的审美心理作出梳理,并从儿童的角度对人类审美发生进行思考,这一研究方向在十七八年前即已发端,但真正投入紧张思



将登泰山雪满山(中国画) 汤岚

与朋友在沪创办《新诗》月刊,使之成为海派诗人交流园地。1937 年初,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戴望舒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施蛰存曾在信中对他说:“徐志摩而后,你是有望成为中国大诗人的。”

1937 年 11 月,上海

租界成为“孤岛”。翌夏,戴望舒移居香港从事文化工作。1939 年 10 月,戴望舒与艾青在香港创办《顶点》诗刊,创刊号《编后杂记》指出:“《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香港沦陷后,戴望舒被日军逮捕;隔了数月,经叶灵风疏通,他被“保释”出狱,直至抗战胜利才得以重返山城。1948 年 2 月,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戴望舒第四本诗集《灾难的岁月》,《诗创造》杂志旋登广告:“戴望舒先生,是新诗拓荒者之一……近年来,他专门致力于翻译和介绍工作,很少创作,这本《灾难的岁月》,便是从少数诗作中选辑而成。”其中,部分诗作于抗战前,交织着关于历史与个体、生与死、永恒与有限的人生沉思;部分诗作于抗战期间,风格转换,抒写了民族的集体创痛和渴望。

戴望舒生平创作的诗虽仅百余首,却在我国诗坛有着重要位置,这是因为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对海派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序跋精粹



型”。

1935 年 5 月,戴望舒返回上海,那位姑娘却已与她喜欢的一名推销员恋爱。不久,戴望舒结识像自己在《雨巷》中所写的“丁香”那样“结着愁怨”的另一位姑娘,逐渐走出失恋阴影。其间,戴望舒曾在沪主编《现代诗风》杂志,创刊号印千册,一下子卖完;接着,为了同“北方诗派”携手,他

需要一点悲观

周炳掇

有一项发现是:在儿童时期最为乐观的人死得最早,而较悲观的人活得较长。该研究还发现那些乐观的儿童长大以后往往招惹很多坏习惯,如抽烟、酗酒或者是危险度很高的嗜好。同年,一本叫《个性和社会心理学》的杂志随访了 250 对夫妻,结果发现处事过分乐观的人应对紧急事态的能力较差。研究人员感到惊讶,上面这些案例和通常认为的“生活态度乐观使人身心理健康”的说法大相径庭。

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叫“未雨绸缪”,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需要一点悲观”的智慧。当今世界,乐观主义的文化占主导地位,许多科学研究旨在开发人们的乐观心理。所以人们在职场上很怕被指称为“悲观主义者”,不过,近来越来越多的事例证明:在做重要的决策时,多一点“悲观”的考虑——比如做风险分析、降低预期回报率、预估不测事件等,都是十分必要的。

一位美国教授认为当今社会鼓励人们要百分之九十以上地乐观,这并不妥当,他认为要寻找乐观和悲观的平衡点,应当在 70% 和 30% 之间。

十日谈

我的书房

明起请看一看《出国糗事》。



夜光杯